

明治初期日本朝野在臺灣的探勘與偵查

文／林呈蓉（淡江大學歷史系教授） 圖片提供／國立臺灣圖書館



▲1895年日本伏見宮貞愛親王登陸嘉義布袋嘴。（圖片提供／真理大學臺灣文學資料館名譽館長張良澤教授）

1871年12月，琉球船漂流民在臺灣慘遭原住民殺害的消息傳至日本，翌年，日本當局分別派遣兒玉平輔、成富清風、樺山資紀、城島謙藏、水野遵、黑岡季備、福島九成、松野某等幾組人員前往臺地進行踏查。其中，官拜少佐的樺山資紀把踏查過程的所見所聞順手筆記在隨身小冊上；譯官水野遵則於日後以回憶錄形式把當時的臺地體驗口述下來，讓後世得以一窺19世紀臺灣社會的實態。

前述牡丹社事件的契機，則成為落實近代日本「南進」思考的第一步，而位處日本國境南端的臺灣，則時而成為「南方鎖鑰」，抑或是南方前進基地等不同的角色扮演。套用矢野暢氏在《南進の系譜》書中，以「南方關與」一詞概括「南進」相關之一切，以下則試從近代初期日本朝野之於臺灣

的踏查活動，簡要介紹「臺灣關與」之源流。

依岡部三智雄氏的研究推知，明治初期來臺踏查的日籍人士，大致可分為三種類群，即政府軍方與外交人員、實業界人士，以及以媒體記者為主體的知識界人士。而他們對臺灣深感興趣，有些是立基於國家安全的考量，抑或是為求得貿易商機，以及對海外珍奇異聞好奇等種種不同理由之所致。（參閱附表）

根據岡部三智雄氏的研究推

知，繼牡丹社事件之後，再次吸引日本社會將目光焦點轉移至臺灣的另一關鍵事件，莫過於1885年的「清法戰爭」。眾所周知，1885年法軍對北臺灣的侵擾，主要是源自於清、法對於安南的宗主權之爭；而同一時期，日、清間則針對相互之於朝鮮影響力的角力上，互別苗頭。換言之，



▲山根武亮 1884年10月8日與東鄉平八郎靠港基隆，上岸視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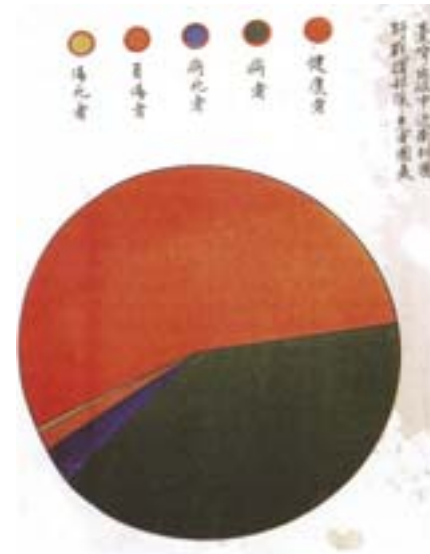
清廷成為日、法在亞洲區域問題上共通的交涉對手。

原本立場一致的日、法兩國，卻因法國對北臺灣的侵擾有延宕趨勢，繼而引發日本對法國產生一股不信任感。日本的隱憂在於，倘若法國對臺灣另有領土野心，從國家防衛線的角度觀之，則日本的南島危機恐怕無可避免。事實上，在其後的清、法議和交涉過程中，臺灣問題始終都是兩造的攻防核心。

日、法兩國對於臺灣的競合關係，促使東鄉平八郎、黑田清隆等人來臺視察清、法兩國在滬尾、基隆戰役的交戰狀態，但與其說是戰技觀摩，倒不如說是監視戰情，恐怕更為適切。

在1895年日本領臺以前，上述這些有臺灣踏查經驗者對於臺灣社會問題的關心，多主眼於風土、民情，以及清廷統治等議題上。臺灣的氣候、環境與衛生狀況的確不佳，但仍可以技術性克服；且相較於日本，臺灣可說是物產豐富、沃野遍地的寶山；至於清廷對於臺灣的統治，則因吏治敗壞，建設匱乏，導致民生困頓。而各種臺灣體驗的心得，也成為未來日本領有臺灣勢必有可為之處的重要依據。

近代初期，日本的臺灣經驗者對臺灣社會的認知，亦為當時日本社會輿論領袖，如《時事新報》的福澤諭吉、《國民新聞》的德富蘇峰、《日本人》的陸羯南、《東京經



▲近衛師團野戰部隊出征臺灣期間傷病者圖表。

濟雜誌》的田口卯吉等人，提供「臺灣論」相關思考的參考依據。無論從國家防衛線角度提出的「臺灣領有論」，或從力行日本「皇化」思惟而切入臺灣社會的移民、殖產問題，或是為求臺灣社會富源的有效開發，而須啓用文明新流之士以推動合理化經營等議題，1890年代日本社會之於臺灣的理解，無論是「條件性認識」或「狀況性發言」，基本上多著眼於殖產興業的發展潛力，而其相關認知亦與近代初期來臺日籍人士的踏查經驗，

緊密相結。

相對的，套用福澤諭吉之語，臺灣經營的方針「單在其土地，島民之有無不置於眼中」，此一時期，日本輿論界對臺灣社會的關心，明顯的無視於島上占多數人口的土著、島民的存在。根據岡部三智雄氏的研究推知，臺灣島民與原住民對待日籍人士的態度，基本上算是友善，除非對方先動手，否則臺灣民眾並不會加害來自海外的人士；至於原住民，則一看見日籍人士便以「祖先」視之。換句話說，這與日本近代初期來臺進行踏查人員，沒有遭遇到所謂民亂或蕃害，明顯有關。

依矢野暢氏之研究推知，近代日本「南進論」的思考源流可追溯自江戶時期的「南方經略論」。而賦有近代裝置特質的「南進論」，則於明治二〇年代（1887-1897）開始百家爭鳴，較具代表性的作品有志賀重昂《南洋時事》、菅原貞風《新日本國南の夢》、田口卯吉《南洋經略論》（雜誌論



▲1895年，日軍攻上澎湖島，展開對臺殖民統治。圖為日軍上陸紀念碑。（圖片提供／林連守）

►征臺近衛師班師返日受到熱烈歡迎。

文)、樽井藤吉《大東合邦論》、福島八十六「南方經營論」(演講筆記)、竹越與三郎《南国記》、杉浦重剛《癡癡夢物語》等。從時序角度觀之，前述的牡丹社事件成為落實幕末開國前「南方經略論」的一個契機；清法戰爭中的北臺之役則造就近代「南進論」百家爭鳴的開始，更為甲午戰爭馬關條約的割臺要求埋下伏筆。

然而，近代初期日本社會的「南進論」與昭和時期賦有國策色彩的「南進論」，相互間的本質與內涵大相逕庭。近代初期「南進論」思想家多為在野人士，此一時期的「南進論」可謂是對政府中央「脫亞入歐」思考的反動。而前述「臺灣關與」則扮演著今後日本經略南方的試金石。套用媒體人德富蘇風在1894年起草〈臺灣佔領の意見書〉的說法，「我邦の前途は北に守りて南に攻めるの方針を取らざる可らざるは、識者の夙に看破する所にして、台湾は恰もその第一著の足溜りとも可申、此れよりして海峽諸半島及び南洋群島に及ぶは、當然の勢ひと存候」，換言之，在北守南進的方針下，臺灣可謂是日本「南方關與」的第一



站，臺灣的存在之於日本的南方進出，其背後所蘊含的意義格外重要，而這也是日籍人士自1871年以後陸續來臺進行探勘與偵查的主因所在。

【參考資料】

1. 小松久吉編，《大路水野邊先生》(臺灣大學圖書館藏)，臺北，大路會事務所出版，1930年。
2. 藤崎濟之助，《臺灣史と樺山大將》(臺灣大學圖書館藏)，東京，國史刊行會，1915。
3. 岡部三智雄，《日本治臺前來臺日人之研究1874-1895》，臺北，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11。
4. 吳密察，〈福澤諭吉的臺灣論〉(收錄於《臺灣近代史研究》)，臺北，稻鄉出版社，1994，頁69-107。
5. 戴天昭，〈法清戰爭和臺灣〉(收錄於《臺灣國際政治史》)，臺北，前衛出版社，2007，頁140-189。
6. 矢野暢，《南進の系譜》，東京，中央公論社，1997，頁4-8、48-50、64、148。



▲《風俗畫報—臺灣征討圖繪》中的插圖，描繪臺人與日軍於竹林中對決。

附表：近代初期日本來臺人士一覽表

來臺者姓名	來臺年代	任務與事蹟
美代清瀧(軍職)	1879.7-1880.12	在福建廈門收集資料，調查臺灣社會實態。
小澤德平(軍職)	1886.5-1888.5	以香港為據點，針對包括臺灣在內的南清各地進行視察；1888年5月完成基隆港市街與兵備圖之繪製；1900-1901年曾任總督府官房副官。
東鄉平八郎(軍職)	1884.10	清法戰爭前後，1884年10月5日率領船艦靠港淡水，7日改於基隆下錨，並於翌日與下錨山根武亮上岸，視察戰況。1895年5-11月曾參與臺灣征討。
山根武亮(軍職)	1884.10	1884年10月8日，與艦長東鄉平八郎靠港基隆，上岸視察。1885年，擔任臨時臺灣鐵道局長，協助臺灣鐵道建設的調查，以及自內陸使鐵路之修建。
黑田清隆(軍職)	1885.5	清法戰爭期間，任內閣顧問，帶領陸軍中尉小澤德平、海軍少尉田中綱敷、吉井幸藏、粗良長調，會同清次郎等人於5月14日登陸淡水，翌日離開轉向基隆，並與小牧昌榮、澤八郎、吉井幸藏，會同清次郎等人上岸視察後，於16日駛離基隆。
安原金次(軍職)	1888.7-11 1891.4-5 1894.9 1895.1 1895.5-8	1888年7月，以海軍譯館人員身分進入基隆港，並上岸視察。1891年4月，與七尾兼三郎等人來到淡水，調查臺北。1894年9月，以甲午戰役作戰大本營翻譯身分，調查臺灣的地理與兵備狀況。1895年5月-6月，協同樺山資紀總督進入臺北城。
上野專一(外事人員)	1890.12-1891.2	1890年12月20日至1891年2月14日，曾以福州領事之姿，兩度進臺視察商機。
前田滿次郎(外事人員)	1893	1893年，搭乘日本郵船會社所屬「酒田丸」之澳洲直航，回程時途經臺灣的打狗、安平，而在南臺灣短暫停留。
止藤之助(移民會社人員)	1893	1893年，搭乘日本郵船會社所屬「酒田丸」之澳洲直航，回程時途經臺灣的打狗、安平，而曾在南臺灣短暫停留。
朝比奈正二(商界)	1873 1895	1873年，曾協助參與奇里山占領征討。日本領臺後，則居住臺灣，經營旅館。
平委喜壽(商界)	1886.4-9	與二本友幸、岡本錦七、鈴木德一郎等人，受日本「中央茶業組合」本派派遣來臺，進行茶業考察。
藤江勝太郎(公職)	1887.7 1888.3 1888.6 1895-1910.11	近代初期，從茶商轉型為茶業技師，多次來臺學習製茶技術，其後，又以茶業技師身分，前後在臺灣總督府民政部、殖產局安平調製茶試驗產等單位任職。1910年3月辭去公職後，改任日本臺灣茶(株)董事兼技師，直至同年11月離職為止。
宮原正靜(公職)	1888.4-6.6	1888年4月任職鹿耳門廳金久支廳時，曾來臺進行糖業考察。
波江野吉太郎(商界)	1894.1 1897 1920	1894年，因友人之建議與進約，到臺灣考察製糖事業。1897年，受大谷高兵衛延攬，應聘為「臺灣貿易會社」職員赴臺。1920年，被邀請擔任日臺人士合資之「臺灣製糖(株)」監察人。
松本龜太郎(商界)	1885.3-11 1886.5-1918.11	1885年以「樂善堂」福州支店長身分，陪同黑田清隆等一行抵臺視察。1886年改以行商身分來臺，在淡水尋找商機，並與尾崎興發簽定代理台同。1887年5月往來臺灣與南清兩地進行貿易。1892年放下事業東洋行派駐人員在淡水與臺北，探尋商機。1895年，甲午戰爭期間以翻譯員身分加入陸軍，其後擔任總督府臺北縣時務課長心得、民生局附等職。1896年4月在北投開設「松濤園」溫泉旅館；1897年又在該地設立商場，奠定日後北投與溫泉發展根基，直至1918年11月病逝世。
名倉信敬(原公職人員)	1888-1889	1888年，受臺灣巡撫劉銘傳聘請，在臺北城內協助鑿井。
七尾兼三郎(軍職)	1889 1891.4 1897-1901	1889年為協助臺北城的鑿井工程，以翻譯之名，陪同名倉信敬、宮原正靜長太郎等人進臺。1891年4月14日至17日陪同海軍大佐安原金次郎來臺訪查，於臺北、淡水、基隆等地短暫停留。日治初期先後擔任首任臺北府府署、基隆府署署長，對基隆市區基礎建設多所貢獻。1928年基隆仙洞內的觀音寺設其想像，供人崇敬。
門田正經(報社記者)	1893.4 1896	1893年曾在南臺灣的打狗、安平短暫停留。1896年以大阪每日新聞社特派員身分來臺採訪總督府民政廳開廳儀式，轉往北臺灣。

(作者整理，參自岡部三智雄氏碩論《日本治臺前來臺日人之研究 1874-1895》)